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发展研究

张英杰, 张亚茹, 宋欣洋, 段秦肖, 李绵雪

大连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8日

摘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宏观背景下, 农村集体经济作为联结国家资源下沉与农民主体性发挥的关键纽带, 其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立足于“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政策导向, 系统梳理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产权结构、治理机制与分配模式上的理论演进脉络, 并基于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深入阐释了农村集体经济在激活要素市场、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等方面的内在功能。研究表明, 当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仍面临集体资产产权能虚化、经营人才匮乏、激励机制缺失以及外部政策协同不足等现实困境, 这些障碍显著制约了集体经济的规模效应与内生增长动力。据此, 本文从制度创新、组织再造与政策协同三个维度提出了优化路径: 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前提下探索股份合作制改革, 完善“政经分离”的治理体系; 依托数字技术赋能集体资产管理与运营,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同时强化财税、金融与土地政策的系统配套, 营造有利于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研究认为, 唯有将理论自觉与地方实践创新相结合, 方能在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 切实发挥农村集体经济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农村集体经济, 内在逻辑, 发展

Research on the Internal Logic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Yingjie Zhang, Yaru Zhang, Xinyang Song, Qinxiao Duan, Mianxue L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an Ocean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Received: July 6, 2026; accepted: August 10, 2026; published: August 18, 2026

文章引用: 张英杰, 张亚茹, 宋欣洋, 段秦肖, 李绵雪.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发展研究[J]. 农业科学, 2026, 16(8): 1283-1288. DOI: 10.12677/hjas.2026.168155

Abstract

Against the macro backdrop of the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cts as a critical link connecting downward allocation of state resources and the exertion of farmers' subjectivity. Its developmental logic and path selection have become a focal point of shared concern amo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Based on the policy of "consolidating and improving the basic rural operation system",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terms of property right structure,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distribution model. Drawing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s of Marxist cooperative economic theory and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t thoroughly elaborates the inherent functions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 activating the factor market and facilitating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small-scale farmers with modern agriculture.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s still confronted with practical dilemmas including the virtualization of rights and functions over collective assets, a shortage of management talents, inadequate incentive mechanisms, and insufficient coordination of external policies. These obstacles significantly restrain the scale effect and endogenous growth momentum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poses optimization approach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and policy coordination. To be specific, it advocates exploring the reform of the shareholding cooperative system under the premise of adhering to collective ownership and improving a governance system featuring the sepa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functions; empowering th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collective assets via digital technology to boost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strengthening systematic supporting fiscal, taxation, financial and land policies to foster 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This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only by integrating theoretical awareness with local practical innovation can we preserve and increase the value of collective assets while effectivel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 advanc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ternal Logic, Developmen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集体经济的研究背景

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农村的重要实现形式,其发展壮大对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基础性作用。“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¹为新时代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随着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面临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管理走向现代治理的深刻转型。在此过程中,集体经济不仅承担着盘活农村沉睡资源、激活要素市场的经济功能,更肩负着联结国家资源下沉与农民主体性发挥的政治与社会功能。有研究指出,通过制度创新、产业升级与治理优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有效增强农村自我发展能力,进而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1]。因此,系统梳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理论演进脉络,深

¹<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4/1021/c40531-40343402.html>

入剖析其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当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仍面临集体资产产权能虚化、经营人才匮乏、激励机制不健全以及外部政策协同不足等多重现实困境。这些问题制约了集体经济规模效应与内生动力的释放。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也是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手段[2][3]。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阐释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论逻辑、治理机制与功能定位,并在分析现实困境的基础上,从制度创新、组织再造与政策协同等维度提出优化路径。研究目的在于为政策制定者与实务工作者提供理论参考,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更大效能。

2.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内在逻辑

2.1. 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溯源

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解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逻辑提供了互补性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起源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其核心在于通过劳动者的联合与协作,克服个体小生产的分散性与脆弱性,进而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分析巴黎公社经验及俄国农业问题时指出,合作社是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其价值在于保留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权的同时,通过联合劳动实现规模效益。这一理论对当代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启示在于,集体经济组织并非对家庭经营的否定,而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通过合作与联合的方式,提升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与市场谈判能力。正如有学者指出,合作经济理论构成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的理论基础[4]。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产权、交易成本与制度变迁的角度,为阐释集体经济的内部治理结构提供了分析工具。科斯与诺思等人强调,清晰的产权界定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然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集体资产产权往往具有“共有”与“成员权”双重属性,这导致产权能虚化与激励不足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表明,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通过股份合作等制度创新,可以在保留集体资产不可分割底线的同时,赋予成员清晰的收益权与监督权,从而有效缓解“搭便车”行为与代理成本问题。两种理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强调集体行动的社会价值与制度定向,新制度经济学则聚焦于微观主体的激励相容与效率改善。二者的融合为本文后续分析集体经济的产权改革、治理优化与政策协同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框架。

2.2. 产权激励、治理结构与组织效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可以从产权激励、治理结构与组织效率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加以解析。产权激励构成了集体经济有效运转的逻辑起点。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底线前提下,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使集体资产产权从“虚化”转向“实化”,是激发成员参与热情的关键。研究表明,股份合作制改革通过将集体资产量化到人,赋予成员清晰的收益权与监督权,能够在保持集体资产整体性的同时,有效缓解“搭便车”行为与代理成本问题,从而为集体经济注入内生动力[1]。这种产权安排并非对集体公有属性的否定,而是在公有制框架内引入了市场化的激励相容机制。

治理结构则决定了产权激励能否转化为稳定的组织效能。传统“政经合一”的治理模式将村务管理与集体经济经营混同,容易导致决策权责不清、监督机制失灵等问题。从“政经合一”向“政经分离”的治理逻辑演变,意味着集体经济组织逐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其内部决策、执行与监督机制得以规范化。这种分离有助于明晰村委会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权责边界,使集体经济组织能够遵循市场规律进行专业化运营,同时保留其服务集体成员的社会功能。在组织效率层面,集体经济的规模效应与资源

整合能力依赖于合理的内部治理安排。高效的治理结构能够降低内部交易成本,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使分散的农户在联合经营中实现“1+1>2”的协同效应。有学者指出,价值引领机制、行动协同机制与制度建设机制三者共同塑造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缺失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组织效率都难以有效释放[2]。综合来看,产权激励为成员提供了参与的动力,治理结构为组织设定了运行的规则,组织效率则反映了二者耦合后的实际产出。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构成了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链条,缺一不可。

3.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资源禀赋约束、制度壁垒与市场参与不足构成了当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三大现实困境。在资源禀赋层面,多数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村庄,普遍面临土地细碎化程度高、集体经营性资产匮乏、优质劳动力持续外流等结构性制约。有限的自然资源与资本积累难以支撑集体经济组织实现规模化经营与产业升级,导致其长期陷入“有组织无产业”或“有资产无收益”的被动局面。有研究指出,农村资源要素供给不足已成为制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的首要瓶颈。制度壁垒则集中体现在集体资产产权权能尚未完全落实。尽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在实践中,集体资产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之间的边界仍存模糊地带,成员对集体资产的收益权与监督权往往流于形式。加之“政经合一”的传统治理惯性尚未彻底打破,集体经济组织在法人地位确立、独立经营决策以及市场风险承担等方面仍受制于行政管理体系,难以真正成长为自主运营的市场主体。市场参与不足则表现为集体经济组织在要素获取、产品流通与品牌建设等环节竞争力薄弱。受制于经营人才匮乏、管理思维滞后以及融资渠道狭窄,大多数集体经济组织仅限于资源发包、物业租赁等低端业态,深度参与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数字农业等高附加值产业链的能力不足。上述三重困境相互交织、互为因果,若不加以系统破解,集体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与规模效应将难以有效释放[5]。

4. 典型实践案例分析

4.1. 案例一：浙江义乌何斯路村——股份合作改革 + 文旅产业融合破解产权虚化困境

何斯路村早年集体经营性资产薄弱,村民对集体事务参与度低,核心症结在于集体资产产权模糊、收益分配机制缺失,是典型“资源闲置、权能虚化”村庄。该村全面推行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将村内山林、闲置厂房、集体建设用地全部折股量化至全体村民,设置人口股、土地股双重股权,每年集体经营利润按股分红,村民可通过股东代表大会全程监督集体资产收支、项目投资。

同步推进“政经分离”,单独成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村委会分设办公、权责分割:村委会负责民生、综治等公共事务,合作社专职运营文旅、特色农业产业。依托村内古村落资源,合作社整合全村闲置农房打造民宿集群,联合农户发展薰衣草观光、研学旅游,搭建数字化资产管理平台,线上公开资产租赁、项目营收数据。改革后,村集体年收入从不足10万元增长至800余万元,村民人均分红超3000元。

案例印证:股份合作量化确权、政经分离治理、数字技术监管能够有效解决集体资产产权虚化、激励不足问题,打通产权激励转化为组织效率的路径。

4.2. 案例二：山东东营联合片区跨村联营——政策协同 + 人才引育化解资源与人才双重约束

东营部分单村土地零散、资产单薄,单独发展产业成本高、抗风险能力弱,同时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专业经营人才稀缺。当地政府打破行政村边界,推动周边6个薄弱村组建联合集体经济合作社,统一整合连片土地、闲置集体厂房,实现片区资源统筹配置。

政策层面形成财税、金融、土地配套协同机制：财政专项资金倾斜片区产业建设，农商行推出集体产业专项低息贷款，优先保障片区特色种植产业园建设用地指标；人才方面出台乡村运营官扶持政策，面向社会招聘专业农业运营、电商管理人才，由财政承担岗位补贴，同时吸纳返乡乡贤、种植大户进入合作社经营班子。合作社统一发展中草药种植、农产品深加工，统一打造区域农产品品牌对接商超与线上电商渠道，分散单村经营风险，实现规模经营。片区 6 个村集体年收入全部突破 20 万元，彻底摆脱集体经济空壳困境。

案例印证：跨村组团协同发展、多维度政策配套、专业化人才引育，能够破解资源禀赋不足、经营人才短缺、市场竞争力弱的多重现实困境。

5. 深化改革、创新模式与协同治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推进路径

针对上述困境，农村集体经济的破局之道需从深化改革、创新模式与协同治理三个维度系统推进。深化改革的核心在于持续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底线的前提下，应加快推动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将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赋予其清晰的收益权与监督权，从而解决权能虚化、激励不足的问题[3]。同时，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治理体系改革，厘清村村民委员会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职能边界，使集体经济组织能够依法独立承担民事权利与责任，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

创新模式是提升集体经济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应积极依托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契机，将数字技术深度嵌入集体资产管理与运营全流程。通过建立集体资产数字化监管平台与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实现资源公开透明流转，降低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在产业层面，应摒弃单纯依赖资源发包的低端路径，主动对接现代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探索“集体经济组织 + 龙头企业 + 农户”的多元合作模式。例如，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劳力与政策资源上的整合优势，引入社会资本共建特色产业园区，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联结机制[1]。

协同治理旨在为集体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应强化财税、金融与土地政策的系统性配套，建立健全财政资金投入形成的资产转交集体经济组织持有并管护的机制，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开发契合集体经济特征的信用贷款与保险产品。此外，完善乡村人才引育机制，通过设立“乡村运营官”等岗位、鼓励退休干部与乡贤返乡参与经营，逐步破解人才匮乏瓶颈。乡镇政府则需从直接干预转向规划引导与公共服务供给，推动集体经济从“单村作战”向“片区组团”发展，通过联合经营实现规模效应与风险分散[5]。唯有将制度创新、技术赋能与政策协同形成合力，方能激活集体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使其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基础性支撑作用。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围绕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展开系统分析，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在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解集体经济提供了互补性框架：前者揭示了集体行动的制度定向与社会价值，后者则聚焦于产权界定与治理激励对组织效率的影响。二者的融合表明，产权激励、治理结构与组织效率构成了集体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链条。在现实层面，当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仍面临资产权能虚化、经营人才匮乏与市场参与不足等多重困境，这些障碍相互交织，制约了集体经济的规模效应与内生增长动力。在路径层面，唯有将制度创新、组织再造与政策协同形成合力，方能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前提下激活集体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使其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基础性支撑作用[1] [3]。

展望未来，本研究认为以下几个方向值得持续关注。在理论深化层面，应进一步探究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成员权能的精细化界定与法律保障问题，特别是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中“量化到人”与“确

权到户”之间的张力与协调机制。在治理转型层面，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深入推进，数字技术如何嵌入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管理、财务公开与民主决策流程，进而提升治理效能与成员参与度，是一个具有重要实践价值的研究课题。在政策协同层面，如何构建财政、金融、土地与人才政策的系统配套机制，使外部资源能够有效转化为集体经济的可持续运营能力，仍需更为深入的制度设计研究。此外，随着城乡融合发展的加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何从封闭走向开放，在保障成员利益的前提下吸引社会资本与专业人才参与经营，实现“内源”与“外源”动力的有机统合，亦是未来研究需要回应的关键议题。

参考文献

- [1] 王钰涵.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研究[J]. 黑龙江粮食, 2026(3): 116-118.
- [2] 吴兵兵, 刘伟. “内圆外方”: 基础薄弱型村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践逻辑与内在机制——基于桂中南D村的案例研究[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26, 28(2): 75-87.
- [3] 周艳琴. 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以沙湾区为例[J]. 智慧农业导刊, 2026, 6(2): 86-88, 97.
- [4] 杨帮莲.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创新与实践路径研究[J]. 中国集体经济, 2026(9): 5-8.
- [5] 施显帅, 陈萍萍.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J]. 农业经济, 2025(3): 52-54.